

中国古代以农业立国，民以食为天，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始终是国家和社会需要重视的重要问题。为了总结农业发展经验和指导农事生产，中国古代编写了大量的农学类书籍，成为中华民族宝贵的农业和文化遗产。其中，《王桢农书》是中国古代四大农书之一，曾被国外农学专家誉之为中国古代最有魅力的一部农书。《王桢农书》以作者王桢命名。王桢，字伯善，为元初东平路泰安州人（今山东泰安），元世祖至元年曾出任泰安州教授，元成宗元贞元年（1295年）任旌德（今安徽旌德）县尹，大德四年（1300年）转任永丰（今江西广丰）县尹，在此期间完成了《王桢农书》。

（一）

王桢所生活的元代非常重视农桑，忽必烈接受臣下的建议劝课农桑，不仅设立专门的农业机构劝农司，向全国派遣专门进行农业管理和督导的劝农官，并且把农业生产发展的好坏作为官员绩效考核的重要依据。朝廷时常发布劝农的诏令，官员也经常撰写与农业相关的诗文，这不仅促进了农业生产的恢复发展，而且也 为农学类书籍的编写、刻印创造了良好氛围。《王桢农书》中各卷目都反复强调政府劝导农业生产的重要性，主张官府应该从政策上积极引导和鼓励百姓做好农桑工作，这既是元朝从游牧王朝向农业国家调适的大势所趋，也是王桢个人为官成长经历的真实体会。

《王桢农书》继承了中国古代农书编纂的优良传统，顺应了元朝重视农事经验总结的潮流，更是建立在其农业管理实践基础上的创新成果。王桢兼有北方的生活阅历和南方的工作经历，不仅喜欢钻研农业科学技术，而且热爱从事生产劳动，关心民众疾苦。据《旌德县志》记载，王桢担任县尹期间，不喜欢高坐衙署之内，而是带领家丁开垦废弃田园，并引泉水围池浇地，分别种植谷物、水稻，周边还栽上桑树、枣树和木棉，亲自给老百姓示范种田和园艺之法。他给自



□ 孙 爽

（二）

己的住所取名“山在”，给园圃命名“偕乐”。王桢还非常喜欢研究农业器具，他不仅能复原一些古代的农业生产工具，而且发挥聪明才智对现有农业机械进行升级改造，并将使用方法教给劳动人民。王桢就是在这种大量参与和指导农业生产实践的基础上完成了这部农书，为了跟古代各种其他农书相区分，后人一般称之为《王桢农书》。

全面记载我国南北方各地的农业发展状况是《王桢农书》的一大特色。在此之前的农书基本上都是局限于某个区域的农业状况，如《汜胜之书》反映了以关中地区为中心的我国西北部的农业情况，《齐民要术》也只是把范围扩大到了黄河流域的北方农业生产状况，涉及南方农业的农书几乎没有。王桢生活的元朝实现了国家的空前大一统，社会生活比较安定，农业生产有了恢复发展，特别是

南北方的交流进一步扩大。《王桢农书》全面反映了以黄河流域为中心的北方旱田和以长江流域为中心的南方水田的耕作技术和生产实践的真实样貌，书中绘制的《授时指掌活法图》《全国农业情况图》准确记录了当时全国农业的发展现状。由于气候、土壤、水文等地区性差异的存在，各地农业生产也体现出明显的不同。《王桢农书》中关照到了南北方农业的区别，强调要根据各地的风土条件因地制宜发展农业生产，但是又重视各地农业的交流和互补，主张通过南北互利提高农业生产水平，特别是在农器具的使用上，甚至一些甜瓜、棉花等的作物引种和栽培技术管理都可以互相借鉴。如关于让蚕上簇作茧的簇蚕方法南北方有明显差异，王桢比较了北方屋外露簇和南方屋内簇的利弊，特别指出露簇的危害较大，因此在书中介绍了一种更好的屋簇方法让北方改进使用。

《王桢农书》由《农桑通诀》《百谷谱》和《农器图谱》三个部分组成，全书十三万余字。《农桑通诀》为

全书的总论，从整体上介绍了我国农业发展的历史和生产经验的总结，不仅系统论述了开垦、播种、施肥、收获、储藏的生产全过程，而且论述了家畜禽鱼、果木蚕桑等各种动植物的养育知识。《百谷谱》则是具体就各种谷物、蔬菜瓜果、棉花、茶叶等农作物的栽培技术进行了详细论说，并把各种作物分成了若干属类。《农器图谱》介绍了各种农业生产工具的原理、构造和使用方法。该书涉及了各种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的品种、起源和栽培技术，以及各种林木的种植、家畜的饲养、虫鱼的养殖等等方面。可以说，《王桢农书》涵盖了广义农业上的方方面面的内容，广泛涉猎农林牧副渔业多个层面，是一部内涵丰富、展示全面的农学全书，继承并且超越了以往的各种农书。

（三）

农书集中反映一个时代的农业生产技术，代表着这个时期的农学发展

水平。《王桢农书》记载了元代农业发展的实际状况，在农书编纂、农学理论、农具制作等方面都有很多突破性的创新，对农学发展贡献巨大。

在农书编纂方法上，《王桢农书》专门列有《农器图谱》部分，绘制了306幅图画，收录了105种农具，占到全书篇幅的五分之四，这在农学史上是首创之举。图文并茂是该书的一大特色亮点，在此之前的农书大多以文字为主，介绍农具时十分抽象，不利于农业知识的理解和传播。《王桢农书》将农具分成二十门，每门细分若干项，每项之下又专门画一图演示，并配以文字注解说明，极大便利了读者。书中图片囊括了耕种、灌溉类农具七十余种，详细解释了其构造、来源、演变和用法，另外还有大量关于田制、仓廩、运输等农业方面的图片。王桢精通机械工具制造原理，通过配图复原了一些失传的农具，如他根据《后汉书》的记载，亲自深入田间地头调研，终于摸清了东汉南阳太守杜诗发明的水排的结构原理，据此绘制出了立轮式和卧轮式水排的样式

图形。他甚至还做了进一步的技术改良，把皮囊鼓风改造为风箱鼓风，更加便于操作使用。另外，如牛转翻车、水转翻车，都是王桢自己所创制，并且加以试验成功之后载入农书，以指导农业生产，提高劳动效率。《农器图谱》中还对黄道婆创造的擀、弹、纺、织等工具作了全面介绍，具有珍贵的历史价值。

王桢非常重视农田灌溉，在书中单列一篇来介绍历代水利状况，创新性地提出了多种引水方法，而且还在《农器图谱》部分介绍了各种水具。他在旌德任职期间，就推广了一种小转翻车，引导农民引水灌溉抗旱，并绘制图样收入书中以发挥更大作用。该书还重视旱地垦殖方法，首次提出了多种旱地处理理论，如南方旱地的“开渠作沟法”、北方旱地的“内外套翻法”等。王桢还提出要耨、织并重，同时也不可忽视其他作物种植和家禽家畜的畜养工作，这种综合发展农业的思想在古代也是一种创新。

王桢游宦南北，博学多识，任职地方期间勤政爱民，劝导农桑功绩显著，所著《王桢农书》内涵丰富，可以称之为体现农本思想的集大成之作。书中不仅蕴含着丰富的农学理论，而且图文并茂对于农业生产具有很强的指导性，是涵括完备农业知识的百科全书，标志着传统农学达到了新的水平。该书付梓之后，立刻引起世人的关注和追捧，其影响甚至超过了元朝官方主持编订的《农桑辑要》。明清时期的农学书籍，很多都沿袭了《王桢农书》的做法和内容，如《农政全书》《授时通考》等书中的农器具部分都是直接照搬此书。《王桢农书》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后世也不断进行翻版刻印，留下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吃货”的“吃道”

□ 崔 庆

吃饱吃好，常情常理，但须遵守一定之规，吃什么、怎么吃，事关德行，“吃”中有“道”。汉时羊续悬鱼，克己之欲，守官之德，全人之情，流芳后世，传为美谈。

当时，羊续身为南阳太守，平时嗜好吃鱼，下属得知后送来好鱼。第一次送鱼，收而不食，公然悬于厅堂，以明心志。第二次送鱼，不收而劝，以悬鱼示之，教育身边人。羊续爱鱼，但从未被口腹之欲迷惑，对于一条鱼背后的细节洞若观火。一是送鱼之人不妥。府丞是太守的直接下属，先例一开，针尖大的窟窿能漏斗大的风。二是信息传播存疑。羊续爱鱼本是私密之事，而府丞却能精准知晓，投机之徒无孔不入，必须加以警示。三是与为政主张相悖。南阳是为大郡，有豪奢之风，羊续本为临危受命，迅速平乱后，思索治本之策，倡导清廉节俭，致力扭转不良风气。在此背景下，羊续悬鱼，驱邪避祸，润物无声，悟者自明，智者自安。

防微杜渐，知易行难，羊续忧虑之事，后世屡见不鲜。执迷于口腹之欲，醉心做饕餮之徒，“吃货”一旦无度，那么祸从嘴起也就不远了。蔡京是北宋权臣，被后世称为“六贼之首”，在生活中是不折不扣的骨灰级“吃货”。蔡府饮食精致，连一个包子都不是凡品，有专人负责加工葱丝，镂空花纹，作为配料，奢豪可见一斑。蔡京还钟爱“黄雀鲊”，这是用一种小鸟经过复杂腌制而成的食物。根据时人记录，蔡府中整整三间房子，从地面到屋顶，堆满了盛满“黄雀鲊”的坛子。单从数量看，这些“黄雀鲊”已经完全脱离了使用价值，成为了一种病态的满足。唐朝的元载与蔡京相似，他喜欢的是胡椒，对这款调料如痴如醉。唐代宗时期，元载位极人臣，史称其家“膏腴别业，珍域相望”。当时胡椒贵重，兼具硬通货的功能，房多钱多胡椒多的

“元三多”自然富甲一方。元载被查处之后，家中抄没的胡椒足有八百石，可谓数量惊人。吃本无罪，奈何纵之。由吃入痴，由痴入贪，由贪至祸，不可救也。

吃在嘴边，行在日常，考验心性。吕蒙正为北宋名相，年轻时候生活窘迫，功成名就后饮食有了变化，喜好鸡舌汤，几乎每天必吃。多一道不平常的“家常菜”，虽然花费不菲，堂堂相府倒也不以为意。直到一天，吕蒙正去花园散步，发现墙角有大如小山的鸡毛堆，询问得知，居然是为做鸡舌汤宰杀留下的鸡毛。平时只顾美味的吕大人深受触动，默然悔悟，此后再也不吃鸡舌汤。由俭入奢，大都放纵自我，以求快意人生，往往事与愿违。由奢入俭，可为而不变为，必须自警自省。

同为宰相，在饮食方面，王安石就是彻彻底底的“豪放派”了。原本可以是吃什么有什么，但王安石却是有什么吃什么。有一次，他在家中“设宴”待客，宴席只有胡饼、肉块、菜羹几样简单食物，客人觉得无法下筷，王大人却风卷残云，连别人吃剩的胡饼也包圆了，来客不禁深感自惭。饮食之道，如果说王安石是随遇而安，那么范仲淹就是刻意修炼了，他的“食粥”故事广为人知。范仲淹家贫，少时求学，以凝固的冷粥和简单的咸菜充饥，留下了“断齑画粥”的典故。家境优渥的同学送来美味佳肴，范仲淹领情却不受食，感谢并解释道，如果猛然享用膏粱厚味，改变了日常习惯，恐怕粗茶淡饭就难以再下咽了。自律如此，知行合一，才有了为国镇边、屡战屡胜，为民政、造福一方，才有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千古豪迈。

由此观之，吃非小事，其中理念足以影响人生。羊续悬鱼，是告诫他人，更是自警自省。饕餮无法遏制贪

婪，最后就会自噬己身。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蔡京败落后，在流放岭南的路上，犹如过街老鼠，老百姓甚至不卖给他食物。这位曾权倾朝野的巨贪，“三千里外无家，孤身骨肉各天涯”，最后病困交加，饥寒交迫，饿死在潭州。元载因罪受诛，刽子手应其“速死”之求，随手剥下他的袜子，塞进他的口中，没有一颗胡椒能帮其掩盖恶臭。古往今来，放纵口腹之欲，小者祸从口入，乃至于自身倾覆；大者销蚀根基，“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成为亡国败家的悲歌前奏。

饮食男女，人之大欲，从吃什么，到怎么吃，既是探索求新，也是修身修心。孔子曾说，“食不厌精，脍不厌细”，绝不是讲究铺陈、穷奢极欲，而以现有食物产生最大效用。“一簋食，一瓢饮”“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才是老夫子推崇的生活方式和价值取向。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取用天地应惜食，随遇而安菜根香。平素看似无用的边角料，经过料理也能大放异彩，既有趣也有意义。例如，菠菜根、芹菜叶，原本都是弃之不用，后来发现洗净的菠菜根红白可爱、口感甘甜，富有营养；芹菜叶焯水和小虾皮凉拌，别有风味，还能降血压。诸如此类，举不胜举，朱元璋“珍珠翡翠白玉汤”的传说，更是广为人知。珍惜食材，本身为出，不是变废为宝，而是发掘本身就是宝，这才是“吃货”应有的态度。

取用有度，饮食有节，简朴为要，欲不盈满，当为护身之法、修身之道。



朱熹与宜兴

□ 陈永跃

南宋绍兴五年（公元1194年），时年已64岁的朱熹接到了自己的老友、宜兴县令高商老寄来的信，信中请他为宜兴新修建的县学校著文以记之。按照儒家的传统，写杂记一类的文章，是要和写碑文一样立意的。立碑著文主要是称颂功德，而这样的文章所记大事、小事各异，故取义也就不一样。因此，清朝姚鼐说，有的人作序与作铭文、作诗文全部用写碑文的体例来写，也有仅仅为了记事而不刻到石头上去的。高商老要朱熹写的，似乎是后者，记事而已。

南宋时，宜兴县的县学校在县衙东南不远的地方，是北宋真宗景德四年建造的。等到了宋仁宗赵祯执政的皇祐初年，县令郑民彝把学校迁到了南兴门外，距当时县衙约有二里远的地方。根据地图推断，旧县城在徐义庄祠东、城南河北、洸滨大道以西、太滆河以南，当在今天的宜兴老年大学处。绍兴元年，南宋的承议郎、浙江丽水人高商老到宜兴任县令后，即重道兴学，引导民风。五年十二月，新学校修建而成，之后高商老就致函朱熹请著文以记。与此同时，朱熹的门人迪功郎孙庭询、贡士邵机等数十人也以书信的方式告诉朱熹：我们宜兴的县学校因年久失修一直得不到改善，直到高商老到这儿任职后，才有了修缮之意。但是因为宜兴地方比较穷，不能马上拿出足够的修缮银两，只好稍加修葺，把校舍修整，将书桌置办齐全。同时，为了学校的长远计，又借闲田数十亩给学校来保证师生的食用，又拿往来长桥过桥费七十余万钱给学校。学校修整一新后，设置《诗》《书》《礼》《乐》四门课程，重视讲求道德性命的学说。与此同步，游说四处，动员四方学子在科举文词有卓然成绩之外，还当知道士子所学有更为高的境界，并在“道问学”上用

功。于是，宜兴的学子由此知所向慕，贤明的士大夫也带着子弟来听课，他们相互勉励，唯恐落伍，有相知恨晚的感觉。更有士大夫捐资以兴学，合县衙与私人之力竟得七百万钱，学校内外又焕然一新。

朱熹的门人对自己的老师说：县令高商老对于宜兴县教育的重视，不止在修葺学校方面可以大书特书，更重要的，他通过对学子们道德性命的深层培养，既为国家造就人才，也改变了社会风俗。这种尊德重教、尊礼崇文的执政有为的为官之道，正是其他官吏所不能做到的。

接到了自己门人情真意切的书信后，朱熹援笔立就，他说，自己在绍兴时曾与高商老有短暂的接触，在那时就知他是个贤明有方的人。现在得知他在宜兴任职后能将政教之本具体加以实施，并取得了如此大的成就，实在是令人赞叹，他十分乐意为宜兴学校作文以记之。更何况宜兴的乡亲能随着县令的重道兴教行为，来积极学习古人的为己之学，而不是汲汲于夸多斗靡的辞章之学追时尚、取世资呢。这又是自己深为感叹而乐为表彰的。高商老于宜兴任职期间不止在教育方面有很显著的成绩，他还重视民风的引导，严格按朝廷的规矩组织祭祀；重视水利工程，疏通老旧河道，以防涝抗旱；注意粮食的存储，在乡间建社仓，储备足够的粮食以备饥荒。他身为县令其所学所行皆出于自己内心的诚恳深情，他言出而人必信，这是他以身教而替言教的结果。高商老真是个贤能良吏。

朱熹的这篇《宜兴县学记》不仅收录在明朝万历年间的《重修宜兴县志》上，也收录在《朱熹师友门人往还书札汇编》中。灯笼继续，慧焰不息。朱熹对宜兴人重视教育的著文记述，更使人了解了千百年来，宜兴尊师重教、尊德崇礼的淳朴民风，而这也是“中国教授之乡”人才迭出的关键所在。

